

# 国运之战,中国为何战败(1)

◆ 金满楼

甲午战争为何失败,有何教训?这个中话题自战败之日起讨论,120年过去,仍未休止。对百年前的这场战争进行反思很有必要。——摘自2014年第6期《同舟共进》

近代史叙述上有一误区,即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,其实更接近明治维新的是清末新政,后者才是中国版的“明治维新”。但就甲午战争而言,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才有意义,因为在这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大战中,日本全然战胜而中国全面失败,结局惨痛,令人难以释怀。百多年来,后人也许要问:同样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国门,同样在屈辱条约下向西方学习,同样的努力、同样的时间段,为何结果会如此不同呢?

## 向先进者学习:学其皮毛与学其灵魂

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,中国似乎重归太平。上至朝廷,下至士绅,无人提起也无人愿意提起那场不愉快的战争,林则徐也不无遗憾地认为:“议和之后,都门仍复恬嬉,大有雨过忘雷之意。海疆之事,转喉触讳,绝口不提。即茶坊酒肆,亦大书‘免谈国是’四字,俨有诗书偶语之禁。”20年后,随“千岁丸”来沪考察的长州藩士高杉晋作得知《海国图志》竟在中国绝版后,不禁感慨地说,清国“徒然提倡僻见,因循苟且,空度岁月……故由此而至衰微也。”《海国图志》系魏源在鸦片战争后为警示国人而编写,孰料国内乏人问津,传入日本后却热销不止,几成洛阳纸贵之势。据统计,《海国图志》在日本的翻刻版本达22种之多,其他如徐继畲的《瀛环志略》、陈逢衡的《英吉利纪略》也都大受欢迎。

日本打开国门始于1853年的“黑船事件”,比中国晚12年。此前,日本同样是闭关

锁国而只在长崎开了一个窗口,允许中国与荷兰商人来往贸易(类似于广州十三行)。列强东来后,这一局面最终被美国准将培理打破,英、法、俄等国纷至沓来,延续了二百多年的德川幕府统治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。

同样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下,中日两国的危机应对却迥然相异。在萨摩、长州等藩下层武士的努力下,幕府统治被迅速推翻。立国之初,明治天皇即将“求知于世界”写入“五条誓约”,在内力与外力交融之下,日本开始了三十年持续不懈的西化强国进程。有学者认为,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,其文化具有原生性与稳定性,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迟钝,转型缓慢;而日本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边缘,一向有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,其文化是边生的、易变的,因而对西洋文化反应敏锐,转型也更为快捷。

或许因为日本一直都在向别国学习,没有历史的包袱和负担,所以失败后能迅速调整角色并转而向更强者学习;而中国则有太多的骄矜与自尊(或说傲慢与自大),失败后往往转化为所谓“阿Q精神”或说“鸵鸟心态”。心里未必真服气,由此也不会认真对待。从“一鸦”到“二鸦”的近20年,正是西方科技文化诸方面突飞猛进之时,以战舰为例,1840年英国舰队仍以风帆动力为主,但到1860年,英法联军全换成了蒸汽战舰。对此,中国却浑然不觉。

薛福成在《庸庵笔记》中记载:1861年,胡林翼调集大军会同安庆后,率幕僚登山以察地势时,“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,迅如奔马,疾如飘风,于是变色不语,勒马回营。中途呕血,几至堕马。”此后,每当有人谈起洋人洋务时,胡林翼总是摇头闭目,神色不怡,称:“此非吾辈所能知也。”数月后,胡林翼薨于军中。胡林翼是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大臣,为何西洋轮船会给他带来如此大的震动?睿智者已经看到,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,但对于新时代他们却一无所知。如此,安能怡然自得?!

“天下事穷则变,变则通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,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

不加细心,以致用非所学,学非所用。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,以为不必学;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,以为不能学。”李鸿章的这段话无疑揭破了中国之痼习,但30年的洋务新政究竟学了什么呢?造船、造枪、造炮,无一不仿制,无一不落后西方二三十年甚至更长。事实证明,向西方学习不能零敲碎打而是系统工程,一个只会仿照枪炮而没有自我创新与自我造血功能国家,除向列强买军舰、送订单,别无选择。举例而言,江南制造总局造了近30年的枪,还设计不出一支具有本国知识产权的步枪,更不要说大批量生产;同时期的日本已设计出适合日本人使用的春田步枪并配给部队。天津机器局为北洋舰队专供炮弹,却造不出作战急需的爆破弹;而同时期的日本人发明了杀伤力极大的“下濑火药”并在黄海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。还有造船、修船等,起步更早的中国都一一被日本用在了后面。

“坚船利炮”是西方给中日两国的第一印象,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中,军工并不是第一位——教育才是。所谓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,只有教育才能让一个国家焕然一新。洋务新政初期,恭亲王奕訢试图将京师同文馆发展为“皇家学院”,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,但他建议从举人优贡甚至翰林编修等高级别士人中选取学员,未免太急功近利,此举引起轩然大波。在守旧派的阻击下,这场无谓的争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。之后,科举依旧,陈腐的学习内容让中国与时代越走越远。

## 日本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

反观日本,明治初即颁布《学制令》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,其“政府主导、全国动员、全民参与”的模式在数十年后成果斐然。1895年,日本的小入学率已达61%;1900年实行小学免收学费后,入学率很快升至98%。在长期而系统的努力下,日本各类人才

##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

[美] 迈克尔·富利洛夫



来提高国家的凝聚力。12月,罗斯福拿海军部长的职位试探了弗兰克·诺克斯的意见。弗兰克·诺克斯是《芝加哥每日新闻报》的出版商,共和党前副总统候选人,曾在

在特迪·罗斯福的莽骑兵部队服役。诺克斯对此很感兴趣并推荐他的老朋友比尔·多诺万到陆军部工作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和多诺万曾在1932年的竞选活动中是对手,但现在看上去总统对这位纽约同乡很有好感。多诺万提出了需要提升全国军备的有益建言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在给诺克斯的信中写道:“比尔·多诺万也是我的旧友,我们曾是法学院的同学。我欢迎他加入内阁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能力,而且也是为了弥补胡佛总统在1929年冬天对多诺万相当不公的安排。”但此后并没有什么发生。多诺万最接近军事行动的事便是1940年初协助发布了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新片《善战的步兵第69团》,该片颂扬了该团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功勋。

多诺万在该片预告推广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。他现年57岁,多年来富足的生活让他身形发胖,面色红润。但他那双蓝色的眼睛依然清亮而动人。他身材并非特别高大,但给人的印象却很魁梧。他英俊、幽默而精明,对人的名字和长相有超乎寻常的记忆力。他比他的绰号显得要温和得多。《纽约时报》称他似“一个乖巧小孩子的护士一样狂野”。他不抽烟,同时如多诺万家族一样,几乎不饮酒。他没有吹嘘自己从军生涯和整箱的奖章。事实上,他拒绝在衣领上佩戴荣誉勋章受奖者专有的蓝色丝绸花结。但他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勃勃雄心显而易见。多诺万通常早起,并享用丰盛的早餐,如一位朋友所说:“他需要补充弹药才能工作。”他一周会狼吞虎咽地看完两三本书。特别是历史和战争类书籍,他会站立在自己办公室的小讲台前阅读。“他的想象力是无限的。”另一位朋友回忆道,“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,惊险刺激让他如赛马般兴奋。”

1940年4月,多诺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他宠爱的女儿帕特丽夏在弗吉尼亚的一场车祸中丧生,终年22岁。他几乎因悲痛而崩溃,且一夜白头。

## 29.为他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

星海决定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。他沉思了片刻,用坚定的语气问:“密斯特史密斯,你说话算数?我把船开回上海,你输5000英镑?”史密斯一惊,他“哦”了一声。他没想到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国船长居然敢于应战,自己把船开回上海。史密斯觉得这位中国年轻人一时负气,他有必要提醒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人:“密斯特贝,你当真决定,自己把船开回去?我不得不提醒你,这船是要过好望角的,好望角,你知道吗?就是我们大英帝国的优秀船长,也不敢轻易过好望角,你,一个中国船长,居然也想闯好望角,那可是航海家的鬼门关,弄不好是要丢掉性命,命船两毁的!”

“这与你有关系吗?”星海看出了史密斯的退缩,他补上一句:“密斯特史密斯,你别以为只有你们英国人才能过好望角,你们能过,我们中国人照样能过。当然,你可以后悔,如果你后悔了,我同意你收回诺言,只是你必须按照我提出的条件,1000英镑,把船开到上海。怎么样?”星海坚定地说。

史密斯被激怒了,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简直不可理喻,敢于拿自己性命做赌资。他甚至于觉得,这个中国人此去简直是送死,因为,过好望角,即便最优秀的船长,也需要一群娴熟的陪伴配合。现在,上船的水手都是英国人,他们能与英国船长配合?既然这个中国人一定要送死,这就不关他的事了。

“我堂堂大英帝国绝不食言,你密斯特贝把船开回上海,我这5000英镑一分也不会少!你想好了没有,想好了我给你签约!”史密斯露出幸灾乐祸的神色。“不过,你现在还可以后悔。”史密斯又补充了一句。“不后悔,现在就签约!”星海不想再多说了,马上逼了一句。

星海上船的时候,那些先行上船的英国船员一看船长是中国人,马上“嘘”了起来,有几个当场表示不干了,准备下船。对这个情景,星海早有准备,他对船员说,让他讲几句话,如果听了以后不想干,可以下船!那天,星海的话很简单,他给船员一个承诺:船到上海,每人奖励500英镑,但是有个前提,就是必须听从他这个船长指挥。船员一听有那么

的培养显著增强了其科技力量,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。换言之,没有教育的近代化,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。如果教育改革是明治维新的灵魂,那么殖产兴业就是日本崛起的基础。如中国的洋务新政,明治政府最初也兴办了很多官营企业,但之后果断地将非军工类企业全部廉价出售,这一做法减轻了财政负担,同时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,后者不但增强了日本国力,也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。反观同时期的中国官办企业,死气沉沉,效率低下,民间资本又长期被压制,毫无竞争力。一个农业社会,如何能对抗工业社会呢?从很大程度上说,清廷对待西方的态度是既惧之(制度、实力)、又厌之(人种、文化),实行的是有距离的接触政策,充其量是“不介入、跟着走”,这与日本采取的主动追随融入的战略迥然不同,其发展速度与效果也由此差异巨大。

中日两国都曾多次派出使团前往西方国家考察访问,如1866年后,清廷相继派出斌椿考察团、蒲安臣使团前往欧美各国,但由于考察人员品阶太低加上清廷重视不够(关键还是对西方文明不以为然),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弃置不用。同一时期,日本也派出高级别的岩仓具视考察团前往欧美,回国后,考察团成员大多成为朝中巨子,给之后明治维新的具体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板。

明治维新为追求“文明开化”,日本官员几乎到了取媚洋人的地步。相比于日本,清廷显然要“自尊”许多。由于洋人不肯遵守天朝礼仪下跪,清朝统治者一直拒绝接见外国使节,直到1873年同治皇帝亲政后,在外方反复交涉下,才不得不答应。可以想象,一个连外交使节都不愿接见的国家,如何能指望它跟上世界潮流并完成民族的复兴呢?桑原鹭藏在《东洋史说苑》中说,中国人爱好和平源于中国人本质上是文弱的,如孔子所说的,“足食、足兵、民信”三者必去其一的话,首先拿掉的就是“足兵”,即军备。桑原鹭藏以为,“中国经历了许多次的战争,然而他们并不好战。比起那些强悍的民族,中国人的个性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”。

大的巨奖,马上表示愿意服从。他们算了一笔账,跑一次航线,工资才100英镑,现在可以奖励500英镑,这样的好处谁肯放弃?

也是星海运气,那天,他们船过好望角的时候,恰逢风浪最小,他们到底还是新船,马力很足,只五六个小时,他们就闯过了好望角。等船行驶到开普敦,星海决定每人先给50英镑,把那伙英国船员乐坏了,拿到钱就到开普敦挥霍一阵。

一个月后,星海稳稳当当把船开回上海,停靠在公司安码头。

章承德真是应了一句老话:大难不死,必有后福。自从渡过了那次贷款危机,他的事业如日中天。申甬火柴厂业务突飞猛进,市场占有率不仅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,而且在东洋和瑞士洋火争夺激烈的上海市场上,也占据了半壁江山。

承德看出了默涵的能量,现在,默涵开辟的外地火柴市场已经稳定,承德决定给默涵再设置一个历练的机会,为他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。承德调整了人员结构,把弟弟承忠调到火柴厂接任默涵工作,把承忠经营的顺记五金号交给默涵打理。他要通过这次担当一面的历练,试探默涵拓展创新本事,以便日后给他承担更重要的职务。

到上海才几年时间,默涵已经从一个宁波小商号的伙计,历练成一位胸有大志的商人。默涵是个勤于学习的人,在上海,他亲身体会了商场的残酷,他觉得,跻身这样残酷的角斗,自身必须要有高超的本领,所以,平时只要有空,他除了进修英语,还找来许多有关商场竞争的书籍勤读。他特别喜爱阅读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书籍,通过大量阅读,默涵已经今非昔比了,西方的经济理念,为这位年轻的宁波后生打开了一扇窗口,这使他拥有了比同辈——甚至于上辈更扎实的经营根基。承德让默涵接替五金号工作,默涵心里大喜,有了这样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,他坚信他学到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。走上任以后,他花了10天时间调查了五金号以往的业务,他看出了五金号可以做的潜力。顺记五金号虽然经营西洋商品,但是经营方式还是中国式的,传统的。而这点恰恰是他可以利用的良机。

## 宁波商人

徐志明

